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西戎

XI

RO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西戎代表作

林友光 屈毓秀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西戎代表作

林友光 屈毓秀 编 责任编辑 顾士鹏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875 插页1 字数274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879

ISBN7-215-01537-8/I · 120 定价8.55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前 言

西戎（原名席诚正），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踏上文学道路的。

西戎出生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南麓一个偏远的穷困山村——蒲县西坡村。当时，正逢“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西戎的一个本家哥哥，曾在大学里受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很有点识才的慧眼。他发现西戎的作文成绩颇佳，便把西戎从乡村小学带到县城读书。西戎的这位堂兄，酷爱文学、音乐和戏剧。他既是国文教员，也教音乐，并且是县里剧团的票友。他常介绍西戎读鲁迅的小说和《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还常带西戎到剧团看戏。这使西戎从小就和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简直成了小戏迷。这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又不无影响。但决定西戎从事革命文学创作，还是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6年春，红军东渡黄河，到了西戎的家乡。这支革命队伍，在这块贫瘠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种子。不久，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吕梁山中的小城蒲县，给这偏僻的县城带来了新文化的信息。什么抗日歌曲啦，革命戏剧、歌舞啦，

都使西戎着迷，也使他大开眼界。西戎向往着一个全新的天地：到抗日前线去，到革命的熔炉中去！不久，他参加了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团，唱歌、演戏、跳舞、画画、写标语、拉二胡，他成了工作团里的骨干宣传队员。当时，西戎只有十六岁。

革命队伍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西戎在这个摇篮里锻炼成长。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西戎随工作团西渡黄河，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首府延安。这在西戎的生活史上，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在延安“鲁艺”学习文学、戏剧、音乐。这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当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西戎在“鲁艺”努力汲取知识的营养，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但仍是值得庆幸的。学习结束后，他即随团东渡黄河到了晋西北，编入新军决死二纵队的吕梁剧社，当了一名演员。西戎在革命队伍中渐渐成熟了，这年五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的年代里，总是来去匆匆。1940年冬，因敌人加紧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包围，剧社奉命回到了延安。为了培养文艺人才，上级打算输送一批文艺宣传骨干到“鲁艺”深造，西戎因文化基础较差，未被录取，但他却有幸进了“鲁艺”附设的干部班。半年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办了个部队艺术学校，西戎成了这个艺术学校戏剧班的正式学员。他又一次获得了学习文艺基础理论、提高文学素养的良机。但是，将来走什么道路、向什么专业发展呢？西戎在《我迈出的第一步》这篇文章中写道：“当演员，我的个头矮小；学美术，缺乏素养基础；学音乐，嗓子也变坏了，光会拉拉二胡，也算不上什么能耐。思来想去，自觉对文学比其他专业兴趣更浓。于是，我便练习着写歌词、诗和小故事。”这就是西戎后来成为一位作家的发端。

但文学道路并不是宽阔平坦的。它需要生活，需要才气，需

要艰辛的劳作。1942年春末，西戎自部队艺术学校结业后，被编入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战斗剧社是贺龙同志最喜爱的剧社之一。那里人才济济，都要在文艺创作上大显身手，而西戎在一个时间内却苦于写不出满意的剧本，深深陷入苦恼之中。剧本写不成，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思考，就把1940年初夏一次反扫荡中的亲身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我掉了队后》，发表在1942年10月3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篇歌颂军民鱼水情的小说，今天看来自然十分幼稚，但在西戎的文学道路上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提高了西戎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勇气，而且使西戎懂得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道理：文学创作要来自生活。因此，西戎称《我掉了队后》是“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西戎随战斗剧社精减干部又重返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自此一直到1949年南下，西戎没有离开吕梁这块土地。他和吕梁山的军民同甘共苦，生活、战斗在一起。人民的乳汁哺育着作家的成长，作家在人民的土地上耕耘。他和当时的其他文学青年一起，深入生活第一线，学做群众工作，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欢乐，积累了生活素材，提高了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这对西戎的创作思想、审美观点和文学风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根据下乡积累的生活，创作了《受苦的日子算完了》、《二爹》等小说。一年后，经过群众生活洗礼的西戎回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参加整风运动。在这期间，他和芦梦、孙谦、常功等同志合作，根据减租减息中的生活，创作了大型秧歌剧《王德锁减租》。剧本描写了一个斗争性不强的农民王德锁，如何在群众斗争中，在农会的帮助下，克服了软弱性和散漫性，坚定起来。剧本演出后，

得到观众好评，在抗日七周年时，获得晋绥边区举办的“七七文艺奖金”戏剧一等奖。冯牧在评论《王德锁减租》时写道：

“这是一个艺术品。作者为我们绘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作斗争的鲜明图画，它不借助于任何抽象政治口号来说明主题的中心，而是通过了人物形象来表现出当前的现实，通过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来说明减租运动的重要及其解决的道路。”^①《王德锁减租》虽然是戏剧，但它的成功，表明西戎在概括生活、表现生活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参加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的创作，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吕梁英雄传》写于1945年6月至1946年8月。其时，西戎和马烽都已调到《晋绥大众报》任编辑，适逢边区召开群英大会，他们便把民兵英雄的战斗事迹，编成故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因为小说采用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运用生动的群众语言，讲求紧凑的故事情节，表现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时出生入死的斗争，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成为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巨著，载入中国新文学的史册。西戎认为，这部作品成功的奥秘在于：“到革命队伍里，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减租、反霸、反奸、反扫荡，各种生活的浪涛，都在我身上留下冲击的痕印……成了我写这部作品时不可缺少的生活积累。”^②他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生活培养了作家，作家离不开生活。”^③

1947年，西戎又一次获得了深入生活的机会。他参加了土地改革，深感农民一旦摆脱了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政治上得到

① 冯牧的《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读晋绥边区“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见1945年5月6日《解放日报》。

②③ 见西戎《〈吕梁英雄传〉写作前后》。

了解放，随之便要求思想上的解放。他们强烈要求冲破一切旧制度、旧风俗、旧传统的束缚。尤其是妇女受封建婚姻的迫害最为严重，所以要求婚姻自主也最为迫切。西戎创作了反映婚姻生活的小说《活出来了》、《喜事》、《谁害的》。尔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了节节胜利，西戎离开了哺育他的英雄土地吕梁山，在炮火中，越秦岭，过剑阁，随第一野战军于1950年元旦，到了蓉城成都。一种新的生活——建设新中国的生活，在作家面前展开了。

西戎在建国初期，在四川从事建设新文艺的组织工作和编辑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因为忙于行政事务和脱离生活，写作很少。1953年，他回到山西，回到故土，兼任汾阳县县委副书记。1955年，他任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作协山西分会副主席、《火花》文学月刊主编。西戎重新植根于黄土高原的沃土之中，这对于他成为“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生活总是慷慨的。农村现实生活为作家铺开了广阔的天地；作家在广阔的天地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西戎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独具风格的优秀作品。如描写合作化后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纠纷》；表现初级合作社时的新生活、新风貌的《宋老大进城》；揭示富裕中农在合作化中的复杂心理的《王仁厚和他的亲家》；批评干部作风粗暴的《盖马棚》、《行医事件》，以及批评农民落后意识的《赖大嫂》等等。正当作家处于青春年华、创作旺盛的时候，《赖大嫂》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不久，又开始了动荡不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西戎和许多作家的命运一样，失去了创作的权利。“四人帮”倒台之后，西戎重新拿起生疏的笔，并且力图在小说创作中，开掘新

的创作题材，进行新的探索，发表了短篇小说《春牛妈》、《赵庄闹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显示作家要挽回已经失去的年华。但因十年浩劫给作家造成的精神和身体的创伤，要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生活，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可以说是力不从心了。

二

当代中国文学群星，各领风骚，各呈风采，或如黄山奇峰，拔地而起；或如泰山青松，气派壮阔；或如长江大河，惊涛拍岸；或如庐山烟云，扑朔迷离。但这都不是西戎的创作个性。西戎，像秦晋高原一样，浑厚、自然、朴素；也像秦晋高原的庄稼人一样，实实在在，普普通通。

作家的个性表现为作品的风格。西戎短篇小说的风格，就是浑厚、朴实。他小说的取材来自普普通通的农村生活，刻画的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形象。西戎从创作的第一天起，就把眼光、感情、聚集在农村最普通人的身上；他描绘的是北方农村的风俗画。也正因为这样，西戎的小说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自建国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不正常，工作的重点没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反映到指导文艺创作上，则要求作家写阶级斗争，为中心任务服务，因此，文艺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浓重的阶级斗争的色彩，蒙上左倾思想的灰尘。西戎同样经历了这个复杂的时期。他的某些小说也存有写中心、赶任务的印迹。但当我们编选《西戎代表作》并有机会收集和阅读西戎全部作品时，却发现：虽然现在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已经发生了

极其深刻的变化，西戎的小说却没有因为政治运动的流去而黯然失色，不少篇章仍洋溢着农村生活的光彩，仍闪烁着艺术的光华。作为以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家，西戎自然要写诸如农业合作化这些关系亿万农民生活命运的作品。但无论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还是反右派、反右倾，开展四清运动，西戎都毫不涉足这些惊心动魄的领域。他没有塑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英雄”形象。这可能有对生活把握不准、不愿贸然下笔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我们以为这反映了作家对当时的“斗争”生活有自己的见解，对文艺创作有独特的追求。这就是说，西戎是在农村土壤中成长的，他和农民有血肉的联系，对农民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对农民的内心世界，有透彻的了解。同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坚持文学的真实性的原则。正如西戎在总结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的：

“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要忠于人民，要忠于现实，要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和事，就讴歌称赞；凡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和事，就鞭笞打击；凡属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批评教育。我就是这么样指挥着自己的创作的，并且还给自己约法三章：写真实的，写自己相信的，写自己熟悉的。”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我们以为，这就是西戎小说具有生命活力的奥秘。

解放以后，我国农村的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经历不少政治运动。农业合作化就是一个影响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产方式，乃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大运动。这在西戎短

① 引自西戎《走向广阔的道路》。见《文学的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篇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收入这个集子的就有《纠纷》、《宋老大进城》、《盖马棚》、《王仁厚和他的亲家》、《两洞之间》。但西戎反映农业合作化的着眼点，主要不在当时所强调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而是着重描绘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心灵，揭示合作化后农村产生的新矛盾，尤其描写普通农民在这个重大历史变迁中的精神生活。《纠纷》反映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后一个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问题，即分配问题——男女同工不能同酬，多劳不能多得。但作家不仅仅局限于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写出了生产关系虽然发生急剧的变革，但农民的思想仍然受封建意识、受旧传统的束缚；这些思想又严重地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宋老大进城》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村和农民在初级合作社时期的精神面貌，描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农村图画。因为初级农业社比较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合乎实际的政策。因此，当时农村呈现一派生机。《宋老大进城》还是通过赶车把式宋老大进城为农业社卖粮和买牲口，真实地再现了这个短暂岁月的历史图景。这篇小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塑造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形象——宋老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老大进城》是西戎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是西戎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创造的第一个真正的完美艺术形象。继《宋老大进城》之后，1956年西戎写了《盖马棚》。这篇小说在形象塑造上比《宋老大进城》要逊色得多，但它反映了作家观察生活的敏锐性，接触了合作化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先天不足。西戎在以合作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写得最为深刻、真实、出色的，要数写于1958年的《王仁厚和他的亲家》。

《王仁厚和他的亲家》是西戎唯一的一篇关于“两条道路”

大辩论的作品。它的出发点在于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显然，这是当时创作上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对作家的影响，使作品带着“左”的痕迹。但是，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使读者常常忘记小说的政治目的。同时，小说能够突破政治观念的躯壳，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合作化后农村真实的生活，如农业生产管理不善、农业政策过死、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不能挂钩，影响了农民生产的主动性。作家通过王仁厚道出了农业社的新矛盾：“瞧那个乱窝劲儿，下地一窝蜂，到了黑夜，因为评工分，你多啦，他少啦，争吵半夜，这哪胜各人单干自在呢？”这不正是现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批评“吃大锅饭”的原因之一吗？西戎常常写的是农村普通人的生活，却能捕捉到农村生活中发生的微妙的变化，从而赋予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写于1962年的《赖大嫂》更有代表性。

《赖大嫂》发表的年代是不寻常的。在当时的文艺界，因为自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之后，文艺创作的路子愈来愈窄了，而现实生活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不愿封住自己的嘴，总要用手中的笔，把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对人民的感情，顽强地表现在作品中。西戎当时也不甘于寂寞，力图从荆棘中走出一条道路来。他在谈到《赖大嫂》的创作时说：“当时国家正处恢复时期，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有些消极面能不能写？如何写？毫无把握，只能探索着来。这时我写了《赖大嫂》。”

（《走向广阔的道路》）《赖大嫂》发表后，给作家带来了声誉，也带来了灾难。开始，《赖大嫂》被认为是一篇反映当时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好作品，是“在新生活潮流的冲击下，怎样与自身的旧思想残余作斗争，摆脱旧的习惯势力的羁绊，努力赶上时代

前进的脚步，这也是当前作家的一个重要课题。”^①有的评论工作者认为赖大嫂是一个“中间人物”。其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讨论作家如何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问题。作协副主席邵荃麟肯定了《赖大嫂》，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写“中间人物”，指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西戎当时刚从农村回城，被邀参加了“大连会议”，并根据自己在农村的见闻，谈了几句真话。不料，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所谓“写中间人物论”，《赖大嫂》首当其冲，被树为“写中间人物”的“黑标本”，指责《赖大嫂》歪曲了农民的形象，调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农民指出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事隔十几年之后，《赖大嫂》于1978年才恢复了名誉，认为它体现了作家们对生活的新的开掘。

的确，《赖大嫂》是西戎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开创性的作品，最具有代表性，是他的“写真实的，写自己相信的，写自己熟悉的”文学主张的鲜明体现。《赖大嫂》真实地反映了1962年农村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生活及矛盾，农民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当时，为了恢复农村经济，实行一些比较灵活的经济政策，农民开始得到生息，但左倾政策的影响仍时不时投射在农民的身上，养猪政策的多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赖大嫂三次养猪的历史，便生动地揭示出在政策放宽之后，集体与个人、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和政策的反复无常如何挫伤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但勤劳的农民却不甘于落后，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提高生活水平。

^① 侯璎：《漫谈〈赖大嫂〉》，见《火花》1962年10月号。

这是一幅很有时代感的农村生活图画。赖大嫂和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是很普通的，但在平凡中见精神，在很不起眼的凡人小事中包含深刻的意义。这就是西戎小说所以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而又有时代感、历史感，有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原因之一。

西戎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并非都写得有深度，有的作品就存在就事论事的不足。如《盖马棚》和《行医事件》，是两篇“干预生活”的作品，揭露干部极端不民主、作风简单粗暴，也不乏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本来，关于干部作风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且有历史性的痼疾，是作家们笔下常涉足的领域。可是，由于这两篇作品缺乏从历史和现实体制的高度加以开掘，又没有深刻地揭示官僚主义者的灵魂，所以作品就缺乏打动人们心弦的思想力量，也就难成为上乘之作。粉碎“四人帮”后西戎写的《春牛妈》，描写植棉模范在“文化革命”中受到“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仍不顾自己的安危，在老伴的支持下，坚持棉花试验。小说显然取之于生活的原型，描写是真实的，甚至连某些细节也有生活的根据。春牛妈、春牛爹着实令人敬佩，小说所反映的政治背景也比较重大，但它的艺术魅力却远不如《宋老大进城》和《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原因之一，就是西戎在驾驭重大题材方面不如他写普通生活那样自然、亲切。因此，纵然作家怀着深深的敬意从英雄劳模那里摄取动人的素材，也存在着生涩、僵硬的缺陷。正像一块没有发起来的面团，即使下功夫揉捏，蒸出来的馒头，还是太实，缺乏脍炙人口的艺术力量。

三

文学要写人。

文学要写人的心灵。

西戎曾为自己确定这样一条创作原则：“无论是舞台上，作品中，创造典型性格，创造活起来的艺术形象，永远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①他在其艺术画册里，为中国当代文学描摹出一幅幅很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尽管不是那么五彩缤纷，却也各呈异彩。

努力写出农民形象的真善美，是西戎所追求的崇高艺术情趣。西戎总是以和善的心肠来对待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管是先进人物，还是落后人物，抑或是“中间人物”。西戎在忆及他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喜事》时说：“《喜事》虽然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但从我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来看，应该说是我在创作上发生过转折的作品。”^②为什么呢？西戎认为他在初学阶段，囿于故事叙述，政策图解，从《喜事》之后，才“摸索到要写人，要艺术地表现生活的真实，要给人以美感。”（《关于〈喜事〉的创作经过》）《喜事》描绘的是土改后农村姑娘小秀自由婚姻的一个场景，透着一股淡淡的温馨的诗情，给读者一种赏心悦目的美感。但小秀这一形象只不过是一幅娟秀的素描。《纠纷》里的张老五就比小秀更具立体感。张老五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大男子主义，而且性格执拗，蛮不讲理，漫骂妇女。然而他又很憨直，粗鲁中含着憨态。读者对他又气又爱。因为作家以微笑写他的缺点，在人物的心灵中透出来的是善良而不是丑恶。但张老五在《纠纷》中并不是小说的主角，作家对他并没有重彩浓墨地加以刻画。在塑造形象上真正的突破和成功，如上文提及的，要算发表于1955年的

① 西戎：《文艺创作的中心问题》，见1956年10月4日《山西日报》。

② 西戎：《关于〈喜事〉的创作经过》，见《唐山师院学报》。

《宋老大进城》了。

宋老大是五十年代初期，即初级农业社时期的农民。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但我们仍喜爱宋老大，因为作家在宋老大这一形象上，赋予了生活的美，人情的美，淳朴的美，有北方农村泥土的芳香。初级农业社的小麦获得了丰收，宋老大带着自豪、带着笑声进城了，一路谈笑风生。他自豪，诙谐，幽默，爱管闲事，爱炫耀自己。作家满怀喜悦之情，把宋老大写得非常可爱。请看宋老大初进城的情景：

大车进了城。

因为逢集，今天的人比往日多。街道两旁，早已撑满了布棚，摆满了瓜果摊子。宋老大拢着牲口，响着鞭子，不住的吆喊，好像钻高粱地似的，费了好大劲，大车才从拥挤的人群里，滚到了供销社的门口。

宋老大刚拢住牲口，耳边听见有人说：“嘿，这老汉赶车，真有两手哇！”

宋老大看了那人一眼，摸摸小胡子，自信地说：

“没有这么两手，我们社里几十户人家，也不会推举我赶车。”他向那人伸着三根指头：“不是吹，赶车三·十·年啦！”

“拉的啥？”旁边又有人在问。

“麦子！”

“都是你自己的？”

“有我的一份！”宋老大傲然地回答着，爬到车上去解捆绳。

“打的真不少呀！”旁边的几个人，同时赞叹着。